

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

徐大明 方小兵 主编

语言与政治

Language and Politics

[英] 约翰·约瑟夫 著
林元彪 译
潘文国 审订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
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

徐大明 方小兵 主编

语言与政治

Language and Politics

[英] 约翰·约瑟夫 著

林元彪 译

潘文国 审订

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艺术”资助项目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资助项目

江苏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资助项目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京权图字：01-2017-9072

© John E. Joseph, 2006

Language and Politics by John Joseph,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Edinburgh: 20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与政治 / (英) 约翰·约瑟夫 (John E. Joseph) 著; 林元彪译.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12

(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 / 徐大明, 方小兵主编)

ISBN 978-7-5135-9690-9

I. ①语… II. ①约… ②林… III. ①语言-关系-政治-研究 IV. ①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0616 号

出版人 徐建忠

责任编辑 张立萍

封面设计 高蕾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3

版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5-9690-9

定价 45.0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 296900001

顾 问 (按姓名音序排列)

陈 骏、陈章太、戴庆厦、李 崑、李宇明、穆夫温 (Salikoko Mufwene)、
斯波斯基 (Bernard Spolsky)

主 编

徐大明、方小兵

副主编

王铁琨、姚小平、范德博 (Marinus van den Berg)

编 委 (按姓名音序排列)

蔡永良、陈 敏、陈新仁、丁言仁、范德博、方小兵、葛燕红、
顾利程、郭龙生、郭 熙、刘丹青、刘 骏、王海啸、王建勤、
王 琳、王铁琨、吴志杰、徐大明、徐建忠、姚小平、张治国、
赵蓉晖

和谐语言生活 减缓语言冲突

——序“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

语言（也包括文字）职能主要分工具和文化两大范畴，且这两大范畴又都有显隐二态。就工具范畴看，语言作为显性的工具是用于交际，作为隐性的工具是用于思维。就文化范畴看，语言既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文化最为重要的承载者，这是语言的显性文化职能；语言的隐性文化职能是起到身份认同、情感依存的作用。

百余年来，中国因语言国情所定，一直侧重于从显性工具的角度规划语言，要者有四：其一，统一民族语言和国家语言，消减因方言、语言严重分歧带来的交际障碍。其二，进行汉字的整理与改革，为一些少数民族设计文字或进行文字改革；当年还为这些文字全力配置印刷设备，近几十年专心于进行面向计算机的国际编码，使中华语言文字进入电子时代。其三，探索给汉语拼音的各种方法，最终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使国家通用语言有了优越的拼写和注音工具。其四，大力开展外语教育，以期跨越国家发展中的外语鸿沟。这些语言规划，保证了国家政令畅通，为各民族、各地区甚至为海内外的相互交流提供了方便，为国家的信息化奠定了基础，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做出了贡献。

这些语言规划主要是改善语言的工具职能，当然也兼及语言的文化职能，比如一些少数民族的语音、文字规范化工作等。当今之时，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强势语言，全国已有70%左右的人口能够使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已是响彻大江南北的时代强音。当此之时，当此之世，语言规划也应当以时以势逐渐调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工作重心应由“大力推广”向“规范使用”转变；语言规划在继续关注语言工具职能的同时，要更多关注语言的文化职能。

规划语言的文化职能，首先要坚持“语言平等”的理念。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宪法精神在语言政策、语言观念上的体现。要尊重各民族的语言

言文字、珍重各民族的方言，同时也要平心对待外国语言文字。

其次要具有“语言资源”意识。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包括方言土语)，贮存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和“文化基因”，镌刻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文化身世说明书，滋养着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科学卫护她，传承研究她，开发利用她。

再次要理性规划“语言功能”。由于历史上的多种原因，各语言的发育状态和能够发挥的语言职能是有差异的，比如，在使用人口多少、有无方言分歧、有无民族共同语、有无文字、拥有的文献资料、适用的社会领域等方面，都各不相同或者大不相同。因此，应在“语言平等”理念的基础上，根据语言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有序的语言功能规划，使各种语言及其方言在语言生活中各自发挥其应当发挥的作用。

最后要遵循“自愿自责，国家扶助”的方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各民族如何规划自己的语言，民族自治地方如何规划自己的语言生活，应当按照本民族本地方的意愿进行决策，并为这些决策负责。当在进行和实施这些决策而需要国家帮助时，国家应依法提供智力、财力等方面的援助与扶持。

中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多文字的国度，拥有丰富的语言文字资源，但也存在着或显或隐、或锐或缓的多种语言矛盾。对这些语言矛盾认识不足，处理不当，就可能激化矛盾，甚至发生语言冲突，语言财富变成“社会问题”。语言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一种，也是表现社会矛盾的一种方式，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还是宜于表现社会矛盾的一种方式。近些年，中国的各项改革都进入了“深水区”，语言矛盾易于由少增多、由隐转显、由缓变锐，许多社会矛盾也可能借由语言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中国也可能进入了语言矛盾容易激化甚至容易形成语言冲突的时期。

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地进行语言规划，特别是重视对语言文化职能的规划，重视从语言的隐性文化职能上进行语言规划，就显得尤其重要。这就需要深入了解语言国情，工作做到心中有数，规划做到实事求是；这就需要着力研究语言冲突的机理，透彻剖析国内外语言冲突的案例，制定预防、处理语言冲突的方略，建立解决语言矛盾、语言冲突的有效机制；这就需要密切关注语言舆情，了解社会的语言心理及舆论动向，见微知著，提高对语言冲突的防范应对能力。当然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提高全社会的语言意识，树立科学的语言观，特别是树立科学的语言规范观和

语言发展观，处理好中华各语言、各方言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本土汉语与域外汉语的关系，处理好母语与外语的关系，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并通过语言生活的和谐促进社会生活和谐。

中国的改革开放表现在方方面面，但更重要的是思想上、学术上的改革开放。语言规划是社会实践活动，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徐大明先生具有中外语言学背景，不仅自己学有专攻，而且数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具有学力、眼力和行动力。他所主持的“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此时出版，恰得其时，相信能为新世纪的中国语言规划起到重要的学术借鉴作用。

李宇明

2012年12月12日

序于北京惧闲聊斋

前 言^①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应用语言学抛弃了“语言是一个独立、中立的体系”这一结构主义观点，转而主张语言具有彻底的政治性，同时体现在结构和使用两个方面。这种概念上的转变引发了一些核心议题，包括：语言的选择、语言的正确性、（自我）审查和仇恨言论、表达种族和国家认同的语言行为、性别政治和“强势”语言、修辞与政治宣传，以及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书面语概念的转变。本书将全面探讨这些议题。

在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语言与政治方面的内容时，我始终感到缺少一本教材的支撑，这本教材能聚合上述议题，展示其与语言分析在结构方面的联系及其与应用语言学关注的核心问题的关系。由于“语言与政治”可能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加之有人认为相关概念和方法仅适用于他们研究的范围，因此好像也没有人肯贸然写这样一本书。而诸如本书之类的著作也必然会遭到一些批评，因为总会有人觉得，就语言与政治之关系的核心问题而言，他们所关心的部分都研究得尚不够深入。尽管我一直致力于让本书涵盖的内容更广泛，但我不得不保证全书具有连贯性，以及所涉问题的论述和探讨具有一定的深度，还要符合出版商对内容长度的严格限制，所以一些本来很值得展开讨论的议题我不得不省去或略述。但我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在书中提供了参考文献和延伸阅读建议，这些能够引导读者拓宽对相关议题的了解，而这些文献又进而可以介绍更多、更丰富的文献。

感谢艾伦·戴维斯 (Alan Davies) 和基思·米切尔 (Keith Mitchell) 让本书成为他们系列编著的一部分，感谢爱丁堡大学出版社萨拉·爱德华兹 (Sarah Edwards) 对本书的指导，使这一颇为不易的过程得以顺利完成。再次感谢艾伦，并且感谢凯瑟琳·埃尔德 (Catherine Elder)，感谢他们将我的《语言与政治》一章收录到《应用语言学手册》(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4)。写2004年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在文献方面得到了约翰·克

^① 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下文不再注明。原书注释均以尾注形式出现。

利里 (John Cleary) 的帮助。本书从当时那一章的雏形到今天成书, 耗费了一个学术假期, 这也要非常感谢爱丁堡大学哲学、心理学与语言科学院的鼎力支持。

在诸多我要致谢的人中, 我必须向塔尔博特·J. 泰勒 (Talbot J. Taylor) 单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本书对语言的整体思考离不开与他多年的讨论。虽然我时常看到报道说我和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时是牛津大学的同学, 但事情并非如此。我们之所以能够一直如此了解对方, 主要是因为他既擅长交流又擅长思考。还要感谢恩斯特·普格莱美 (Ernst Pulgram, 1915—2005) 对我的指导, 当时他在英格兰, 我在美国安阿伯。早在语言学界研究方法还处于社会性和政治性两者非此即彼的阶段时, 恩斯特就已经开始两者并重了。在本书快脱稿时, 恩斯特过世, 谨以此书纪念他。

目 录

第1章 概述：政治如何影响语言（以及语言之反渗）	1
1.1 为什么说语言具有政治属性？	1
1.2 不同说话方式所体现的政治	3
1.3 与他人交谈的政治	6
1.4 语言定义的政治性	9
1.5 语言选择中的政治	12
1.6 语言监察中的政治	13
1.7 语言、思想和政治人士	14
1.8 语言 and 选择	18
1.9 结论：语言具有彻头彻尾的政治性	19
第2章 语言和国家	24
2.1 他们和我们	24
2.2 判断“一门语言”的标准	27
2.3 书面语的作用	30
2.4 通过控制变体构建“语言”	31
2.5 语言、知识和权力	35
2.6 新兴语言如何出现：从“下滑的标准”到“世界英语”	39
2.7 压迫和认同	44

第3章 语言选择的社会政治性和语言正确性	47
3.1 作为言者的听者	47
3.2 拒绝杂语现象	48
3.3 教育的作用	51
3.4 语言帝国主义	54
3.5 语言权利	60
3.6 少数民族身份的语言表达	64
第4章 语言中嵌入的政治	70
4.1 符号中的争斗	70
4.2 交流中的争斗	72
4.3 礼貌称呼语	75
4.4 性别化的语言	81
4.5 “无权力”语言	87
4.6 语言变化的政治	88
第5章 禁忌语及其限制	96
5.1 起誓/咒骂	96
5.2 语言卫道士情形	102
5.3 (自我) 审查的政治	108
5.4 仇恨言论	113
5.5 不听恶言恶语的权利?	118
第6章 修辞、宣传和阐释	124
6.1 修辞学与真理对立?	124
6.2 语言、思想和现实	127

6.3 宣传焦虑	131
6.4 新话	134
6.5 语言创造力和制造共识	137
6.6 批评性话语分析	144
6.7 语言在民主国家发挥的功能	149
第7章 结论：权力、霸权与选择	154
7.1 能动作用	154
7.2 西兰花理论	157
7.3 若干结论	161
7.4 启示与运用	163
参考文献	168
译名表	183
译后记	192

第1章 概述：政治如何影响语言 (以及语言之反渗)

1.1 为什么说语言具有政治属性？

过去十年以来，一些在语言起源研究领域享有很高声望的学者一直在提倡一个观点，即语言的起源从根本上说是政治的原因。邓巴（Dunbar 1996）认为，语言因具有区分盟友和敌人、抚慰盟友和潜在盟友的超高效手段功能而得到了发展。德萨莱斯（Dessalles 2000）认为语言源自组成一定规模的“联盟”的需要，代表着社会和政治组织的最初形式：

人类之所以形成语言，是因为一次幸运的变革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祖先的社会组织。为了生存和繁衍，他们发现自己需要组成一定规模的联盟。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个体对联盟成员身份的展示方式，语言出现了。（Dessalles 2000：331—332，笔者译）

尽管这方面的研究难以绝对证实或证伪，语言起源政治因素观的出现，很显然是因为政治视角在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内部日渐得到重视。三十年前，如果有人称政治可能是语言的本质属性，十之八九没人会把他当回事。但这却又是一个“根正苗红”的观点：

因此很显然，国家是自然的产物，而人生来就是政治性动物……总结起来，比起蜜蜂或其他群居动物，人类是更具有政治性的动物，这应该很好理解了。正如我们常说的，自然造物自有其用，而语言正是她给人类单独的恩典。（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卷第2页，乔伊特英译。[1885]）

一切动物都具有政治性，但在有些动物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而人类表现得最明显，其原因正是语言。这位2350多年前的哲学家如此论断，今天会有谁反对吗？

不但有，可能还不在少数，而且这是必然的。因为真要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论断来说，反对意见恰恰是政治的必要条件。较之其他动物，人类的特点首先是懂得反对，其次是懂得争取。正如说话一样，懂得反对也是人类的天性。

但即使是这一点，也有人会表示反对。共识政治的拥趸往往把反对意见看作一种社会弊病、一种破坏力，看作是本能的，更具体地说，或许是一种男性本能。毕竟，亚里士多德的翻译者在翻译这段话时，告诉我们“(男)人^①”是政治性动物，而不是女人。¹语言的某些方面有时候会诱发强烈的反对意见——用男性指代一切性别正是其中一例。但有没有可能亚里士多德的原意是男人和女人都是政治性动物？可能会有人抗议——或附议——女性的交谈和互动方式对抗性较小，政治性不像男性那样明显。

另一个争论的焦点是，“语言天赋”与政治的捆绑程度如何。每一类有感知的物种都会形成社会纽带和社会群体。这种纽带和群体的产生和维持，需要依靠抚慰、表达，以及其他一些能够体现群体内部、领地之间的阶层等级的仪式行为。那又是什么将人类的政治与动物的政治区分开来？仅仅是因为人类的语言能够产生更高的效率吗？还是因为语言让我们的思考更具有政治性？²又或是因为语言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政治维度，如此之深以至其触到了语言功能的核心？

本书认为语言的确具有这种政治维度，并以此作为讨论的前提。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人类学和相关领域各分支学科的同仁，也都以此作为研究的前提。但大多理论语言学研究否认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语言的实际功能凌驾于语言的人际使用，语言与认知密切相关。在这部分研究者看来，语言的政治性顶多不过是次生效应，是附带的结果，是微不足道的偶发现象，不值得，也不大可能对其进行严肃的学理探究。然而，语言学圈子里也有它的政治，而且局面已经是遮不了、盖不住的了——有人认为这是学术研究中最具有政治性的一个领域。在既得利益的捆绑之下，语言学界所谓的“主流”其实是一些很窄的研究。我这并不是在抨击那些不认可语言政治性的语言学研究者，说他们自私自利操纵学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所有的研究者，无论各自支持何种观点，我们在判断一个研究对象是否成立的时候，应当审慎公允地辨析，从而确保我们并不只是打着方法严谨的旗号一味地坚持过时的偏见，这对充分了解语言毫无裨益。

^① 英语用的是“man”。这个词兼有“人类、男人”两种意思。

另外,还有一个概念争议也大,即我们所说的“政治”所指为何。在日常使用中,这个词指代政治人士的所作所为,或者说“城邦”的事务——这是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也是这个词的词源含义(源于希腊语的“城、城邦”)。另一方面,“办公室政治”“性别政治”等词语也渐渐成了十分常见的日常用语。由此可见,“政治”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这可不只是学术术语的情况。对于一切存在权力分配不均的情况,一切体现权力运作或受权力引导(甚至是决定)的个人行为,政治都是适用的。然而,正如我们所见,“权力”也是少有的几个极容易引起争议的词语之一。尽管这个词的含义很难确定,但在用到的时候却总是带有政治寓意。

本书兼采“政治”的宽窄二义。本书研究语言与政治的关系,旨在探讨说话和书写在人际互动中起到的作用。这涉及人们如何用语言组织从家庭到国家各个层面的社会生活,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建构我们对语言本身的认识。在本研究中,我们认为语言不是先天存在的,语言不能脱离人们的使用独立存在。相反,本研究高度重视支撑以下观点的大量证据:

- 一切语言自身的形成脱胎于说话和书写实践以及说话者和写作者的观念(或“意识形态”);
- 个体的语言形式取决于两点,一是说话的对象,二是所说的内容对双方关系的可能影响;
- 身份政治影响着我們如何理解他人说话的内容,其影响之大,足可成为我们判断他人言语真值的首要因素。

本章是全书的第1章。我们将列举一些真实的问题和矛盾,说明语言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为何是应用语言学的焦点。至于这些实例的分析方法,我们在第1章不打算触及太多,也不打算过多征引相关研究。我们会在之后的章节充分引证,并回过头来重新论述这里提及的一些问题,以及展示更多的实例。

1.2 不同说话方式所体现的政治

一天早上,我三岁零四个月的儿子克里斯宾(Crispin)找我修理他的玩具。我说:“Bring it me”^①,他却轻蔑地说:“爸爸,你漏了to,应该说

① 意为“把它拿给我”,英语规范的说法应该是“Bring it to me”。

Bring it to me”。我觉得甚是有趣，微微露出笑意。这么小却知道规范别人的语法，而我的笑则无疑助长了他一脸稚气地咬文嚼字。但我觉得这样不好，他要是在学校里也这样规范其他同学的语法，别人可不会觉得有趣，倒是可能出言嘲讽或拳脚相加。如果别的同学觉得他这是在显摆，他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杀杀他的威风。庆幸的是，克里斯宾居然就这样一直挺过来了。虽然在他六岁半那年，我也偶然听到他对哥哥朱利安（Julian）说“Give it me”，但他的语言使用一直明显地倾向于标准形式。比方说，他就不大可能像朱利安那样用错误的语法讲故事（参见第4章4.6）。研究资料表明，如果小孩子因为纠正同学的语言错误而被修理，那么在他说服老师自己不是挑事者的时候，他对标准语言规范的使用将更具说服力。

对英语母语者而言，不管使用同种方言还是不同方言，将“Bring it me”纠正为“Bring it to me”都毫无必要。很多人都可以接受“Bring me it”^①的说法——当然不是所有；类似地，“Bring it me”的说法也是一半可以接受，不过只是在英国的部分地区。在口头表达中，我还可以接受“Bring them them”^②的说法，但书面语我不能接受。而大多数英语母语者无论口头还是书面都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对于本书当前讨论的主题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我们真的问起来，肯定没有任何人说上面的说法都是可以接受的。人们通常会十分肯定地说其中一个是正确的，另一个可以使用但最好别用，还有一个是完全错误的。甚至是那些平时对一切事情都不常表态的人也会这样明确地回答。

语言的这一独特功能，即充当正误之争的焦点，正是其社会功能的核心。比起我们刚才的那些咬文嚼字，语言的正确性所带来的问题要深刻得多。这些问题被用作判断说话人的才智、勤奋、社会价值，以及受部族长者的关注度等的标准。在现代社会，部族长者的关注度逐渐制度化成“教育”系统，但其中的基本原理始终未变，在最早的人类群体以及现在的灵长类动物群体中都是一个道理。

这种解读语言使用的方式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它决定着一个人在该社会阶层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着谁能够被委以权力和重任。至于掌权者或有意获取权力的人，他们为达目的而操纵语言的种种方法，则体现了更深的“语言—政治”维度。传统上讲，这一维度属于修辞学范畴，亦即亚里士

① 留意其与前文“Bring it me”的区别。

② 意为“把这些拿给他们”，但标准的说法应该是“Bring them to them”。

多德所定义的“劝说艺术”。在现代社会,尤其是20世纪有关潜意识和思想控制的研究发展起来之后,这一维度则逐步归入别有寓意的“政治宣传”范畴。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的使用,可看作将语言的政治维度直接纳入语言研究的一种途径(approach),而理论语言学则试图剥离语言的政治维度。语言教学和学习在应用语言学中所占比重较大,考虑到在具体的习得环境下,此二者通常都要涉及两种文化声誉总体不对等的语言,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上述这些差异,会在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中以及课堂交流的话语中再现。

在教学活动中,这种纠正违背习惯用法的语言权威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受过教育的人应该都有这种体验。举个习惯用法例子,比如多个代词主语并列使用。我小时候总是自然而然地说出这类句子:“me^①和鲍比(Bobby)可以去看电影吗?”结果大人总会纠正我:“你应该说‘鲍比和I^②’”。接着还要解释把“I”放在鲍比前面不礼貌,而且大人还会指出,宾格的“me”放在主语位置有语病。最终我确实改掉了原来的用法,如今作为一个成年人,我确信自己在说这类句子时,开口一定就是“Bobby and I(鲍比和我)”。

但我的儿子朱利安一直到十二岁以后才真正掌握了这个东西。他通常都说:“me和托马斯(Thomas)可以去看电影吗?”然后我也会说:“你应该说‘托马斯和I’”,再做出类似的解释。只不过跟我以前的老师不一样,我这样纠正他的理由并不是我认为用“me”在语法上不通。比如说,我知道在罗曼语族中,只有为了强调,人称代词的宾格才会放在主语位置,而英语如此倾向于这种用法,让我想到这也许是英语语法的一种“自然”特征——如果真的有所谓的语法。³但这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这一特征具有区分教育程度高低的强大标准作用。而作为父亲,我只是想尽我所能避免孩子给人一种没受过教育的感觉,并不是想阻止英语语法的改变,而且这种想法想了也是白想。那么只要这个区分标准客观存在,我就要避免我的孩子为此而遭受排挤。当然话说回来,从孩子的角度而言,大人纠正语病的动机有没有道理,可能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① “me”是“I(我)”的宾格形式。

② “I”是“me(我)”的主格形式。